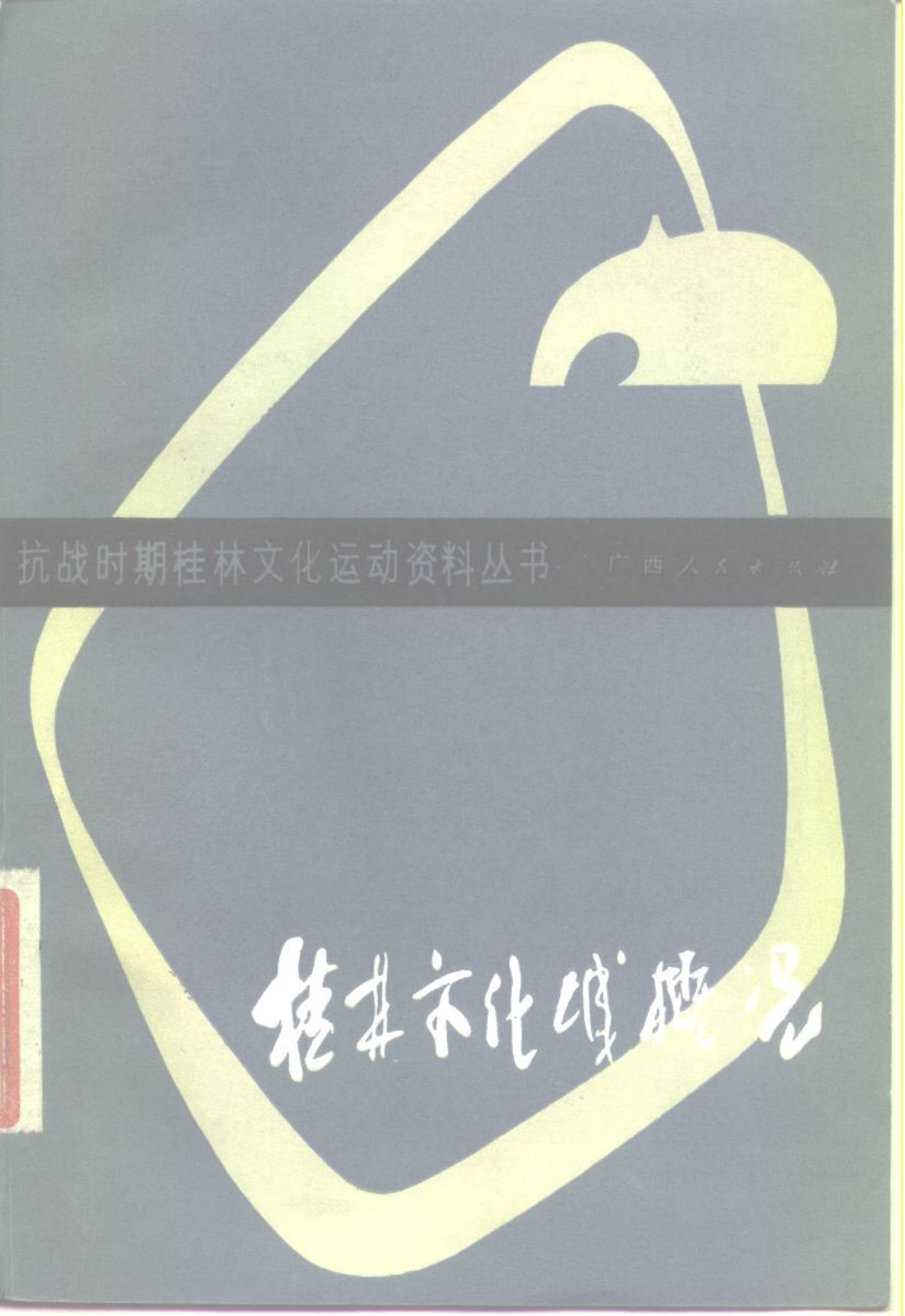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林文化城概况

·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 ·

桂林文化城概况

广西社会科学院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

编著者

杨益群 万一知

王 斌 潘其旭 顾绍柏

桂林文化城概况

广西社会科学院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

编著者：杨益群 王斌 顾绍柏
 万一知 潘其旭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0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5印张 插页4 372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册

书号：10113·338 定价：2.75元

桂林文化城的概况、历史地位及成因

（代序）

杨益群（执笔） 王斌

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文化名人云集，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引起国内外人士的注意，被誉为“文化城”。胡愈之同志在《忆长江同志》一文中写道：“山明水秀的桂林，本来是文化的沙漠，不到几个月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了。”这是对桂林文化城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

一

桂林文化城的始末时间，是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起，至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止，前后达六年之久。这期间，桂林的文化事业云蒸霞蔚，空前繁荣。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人荟萃，人材济济。

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继北平、上海沦陷之后，武汉、广州也先后失守。东北、华北、华东各沦陷区的大批文化人先后汇集桂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投入抗战救亡文化运动。据统计，当时集结在桂林的文化人有一千多名，其中闻名全国的近二百人。一

个城市汇集这么多的人材，这在当时的国统区是独一无二的。诚如当年报纸上所说：“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都占全国第一位。”（王坪：《文化城的文化状况》，载1943年9月8日《广西日报》）。他们当中，既有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家，又有大批作家和艺术家，还有一批专家和教授。在文学方面，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柳亚子、王鲁彦、艾青、艾芜、胡风、邵荃麟、廖沫沙、周立波、司马文森、周钢鸣、黄药眠、聂绀弩、端木蕻良、骆宾基、杨朔、林林、杜宣、秦牧、秦似、陈残云，等等；在戏剧方面，有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熊佛西、蔡楚生、丁西林、焦菊隐、于伶、阳翰笙、马彦祥、金山、瞿白音，等等；在美术方面，有徐悲鸿、丰子恺、叶浅予、黄新波、刘建庵、赖少其、廖冰兄、李桦、周令钊、关山月、余所亚、郁风、阳太阳、张安治，等等；在音乐、舞蹈方面，有张曙、李凌、林路、赵沅、吴晓邦、戴爱莲，等等；专家和学者，有陶行知、邹韬奋、叶圣陶、胡愈之、杨东莼、马君武、李四光、薛暮桥、千家驹、陈此生、张志让、张铁生、陈翰笙，等等；在新闻方面，有范长江、陈同生、徐铸成、孟秋江、王文彬，等等。

这批文化人，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作为桂林文化城的中坚，广泛团结各党派、各阶层的进步人士，组成一支强大的队伍，积极开展抗战文化运动，为整个国统区进步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团体众多，宣传活动卓有成效。

当年桂林进步文化团体的出现，宛如雨后春笋，粗略统计，多达三、四十个。单在文学艺术方面，影响较大的有，以王鲁彦、夏衍、巴金为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以李桦、刘建庵、赖少其、黄新波为首的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和

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以田汉、瞿白音、杜宣为首的新中国剧社，以欧阳予倩为首的广西省立艺术馆，以李文钊、孟超等为首的国防艺术社，以及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抗敌演剧四个队等。有些全国性社团也在桂林创建并设立过总部，如以范长江为首的国际新闻社，以陈同生为首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以李桦为首的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以陶行知为首的生活教育社，此外，还有以作家鹿地亘为首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等。

这些团体，旗帜鲜明地开展各种抗战文化活动，如举办讲座、研究会、座谈会、展览会、纪念会、声讨会、演出会、朗诵会、街头画展、训练班等，宣传抗日，鼓舞群众斗志。其中有不少活动规模较大，影响很广。如鲁迅逝世三、四、五周年纪念日，桂林文艺界均隆重集会，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纪念活动，还举办过《第二届全国木刻展》、《鲁迅逝世三周年木刻展》，都曾引起很强烈的社会反响。又如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举办的为期三个多月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简称“西南剧展”），集中了六省三十多个剧团（队）近千名戏剧工作者，演出了六十多台节目，同时还举行了戏剧资料展览，召开了戏剧工作者大会。这是国统区抗战戏剧活动的一次大检阅，其社会效果之大，意义之深远，实属空前。就在“西南剧展”结束的当天，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赞扬它是“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

（三）报刊杂志猛增，出版事业繁荣。

抗战前，桂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报刊、书店和出版社。在称之为文化城的期间，报刊、书店和出版社激增猛涨。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书店、出版社一百七十九家；印刷厂一百零九家，每月印刷用纸一万五千多令，每月排字三至四千万。当时有影响的

是文化供应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三户图书社、《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西南印刷厂等。在桂林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都是在我党的直接领导或影响下进行工作的，它们始终为推动进步书刊的出版事业而努力，站在反对国民党政府文化专制主义斗争的前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救亡日报》社等出版单位，曾联合三十五家同业，分别致电第三次全国国民参议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反对现行审查制度，要求“迅予明令撤销原稿审查办法，以利抗战宣传”。它们还积极保护作家的权益，坚持出版和发行进步书籍，宣传抗战，因而深受广大作者和读者欢迎。由于它们坚持斗争，使桂林的书刊出版业得到了发展。据统计，共出版发行各类杂志近二百种，报纸从原来只此一家的《广西日报》，增加到十一家。其中颇具影响的报刊杂志有：《野草》（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秦似等主编）、《国文杂志》（叶圣陶主编）、《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叶圣陶主编）、《文艺杂志》（王鲁彦主编）、《文化杂志》（邵荃麟主编）、《文艺生活》（司马文森主编）、《文学创作》（熊佛西主编）、《戏剧春秋》（田汉主编）、《国民公论》（胡愈之、千家驹主编）、《青年文艺》（葛琴主编）、《中国诗坛》（黄宁婴、芦荻主编）、《顶点》（艾青、戴望舒主编）、《人世间》（凤子、周钢鸣主编）、《新音乐》（李凌、林路主编）、《音乐与美术》（张安治、徐杰民、陆华柏主编）、《学习与工作·漫画与木刻》（赖少其主编）和《救亡日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主编），等等。当时，一般报刊的发行量均达到二、三千份，有的达到一万多份，销行全国（包括港澳）各地，远至南洋。一个国统区的小城市，能出版发行这么多宣传抗日的报刊杂志，在国内是罕有的。有的杂志，如《野草》、《自由中国》、《战时艺术》等，还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

当时，还有不少外地的出版物，也纷纷在桂林设立分销处或翻印出版，如重庆的《新华日报》桂林分销处，重庆出版的《群众》、《全民抗战》、《文艺阵地》、《读书月报》和延安出版的《解放》、《文艺战线》、《中国青年》等杂志，也在桂林翻印发行。尤其是新四军的机关刊物《抗敌》杂志，也在桂林出版发行。

当年的桂林文化城，专著的出版也十分可观。除自然科学和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著作以外，仅文艺专著就出版了一千多种，文艺丛书有五十套之多。其中巴金主编的《文学小丛刊》和《文学丛刊》，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邵荃麟主编的《文学创作丛书》，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丛书》，赵家璧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熊佛西主编的《当代文库》，还有《戏剧春秋丛书》和《音乐丛书》等，影响较大。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的桂林，是名不虚传的文化城。当时除了解放区延安以外，桂林实际上成为党所领导的国统区抗战文化最主要、最活跃、最有成效的中心阵地。它同重庆、昆明等地的抗战文化活动汇合在一起，形成了整个国统区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运动。

二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抗战文化，是反映抗日这个重大政治内容，为抗日斗争服务的。桂林文化城的抗战文化活动，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横的方面来看，它不仅同延安和国统区各地的抗战文化相联系，而且同世界反法西斯的文化相联系。从纵的方面来看，它又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在抗日战争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因而，它具有深厚的基础，能够发

挥强大的战斗作用，并取得显著的成绩。概括起来，其成就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时期的新文艺，把国统区的文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桂林的抗日文学艺术，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勇敢地反对日本侵略者，无情地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汉奸的投降卖国罪行，充分发挥了革命文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在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以文艺为武器，坚持同敌人展开不懈的斗争。当大汉奸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时，桂林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走上街头，或深入农村、工厂，以戏剧、诗歌、音乐、漫画、演讲、集会、标语等形式，进行讨汪宣传。桂林戏剧界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汪公演。在举行“纪念‘一·二八’扩大反汪肃奸公演”中，抗宣一队连续三天举行话剧公演，演出了《何必呢》、《日落西山》、《解放》等剧目，揭露汪精卫的卖国罪行。欧阳予倩领导的桂剧实验剧团，献演了讽刺汪精卫之流的新桂剧《胜利年》。文协桂林分会举行了声讨会，并组织作家分别给《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撰写声讨文章。桂林的其他文艺团体也采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讨伐。当时的报纸评价说，桂林文化城打响了国统区文艺界讨汪的第一炮。

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注目，也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因而遭到反动势力的摧残。但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对白色恐怖毫不畏惧，勇敢战斗。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桂林顿时风雨如磐，形势恶化，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被迫封闭，《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进步文化团体和一大批进步刊物，先后被迫停办，有的进步文化人

遭受迫害。夏衍、范长江等同志被迫离桂转移香港。留桂的同志有的由公开转入隐蔽，有的仍坚守原岗位，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救亡日报》在被迫停刊前，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他们拒登国民党中央社诬蔑新四军的电讯，及时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后被“新闻检查处”强行删掉），并赶制周恩来同志亲自为《新华日报》所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著名画家黄新波立即创作出木刻《他并没有死去》等作品，强烈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杀害新四军指战员的暴行，热情歌颂新四军和人民的伟大抗日事业。著名作家聂绀弩化悲愤为嬉笑怒骂，撰写杂文《韩康的药店》，抨击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生活书店、发行反动书刊的罪恶行径。在当时的逆境中，为了继续领导桂林的进步文化运动，党及时选派了邵荃麟同志抵桂接替夏衍同志的工作，并任南方局文化工作组组长，同时又加强了以胡愈之同志为首的文化供应社的力量。田汉和杜宣同志则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集合和团结了在桂的各抗敌演剧队部分骨干及戏剧界进步人士，创办了以民间职业剧团面目出现的新中国剧社，作为我党在西南文化戏剧战线上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经过党和周恩来同志的重新部署，在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下，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很快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桂林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对日寇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不断予以揭露和抨击，唤醒民众。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波、杨秋人、郁风、特伟、温涛、盛此君发起组织的《香港的受难》画展，强烈地揭露控诉了日本法西斯在香港的滔天罪行，激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新中国剧社创作演出的《再会吧，香港！》（田汉、夏衍、洪深编剧），以当时香港的现实为题材，针砭豪门官僚的罪恶行径，歌颂人民抗日爱国热情，表示了人民群众对日寇和国民党黑暗统治抗争的决心。该剧虽横遭反动派禁

演，但经过田汉、夏衍等同志三个月的据理斗争，最后还是易名为《风雨归舟》与桂林观众见面，震动很大。这是国统区抗战戏剧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国统区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同反动当局政治斗争的一大胜利。余所亚的漫画《前线马瘦，后方猪肥》，深刻揭露、尖锐讽刺了国民党贪官污吏破坏抗战的丑恶行径，颇有社会影响。

此外，为保障作家的创作自由和合法著作出版的权益，桂林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展开了持续两年之久的斗争。他们先后制定了“响应当前宪政运动”、“请求实行撤销原稿审查办法以利抗战宣传”、“要求限制印刷商无限增加印刷费”和“敦请出版界提高稿费”等一系列提案，并推选出以胡风为首的三人小组起草出版合同，要求与政府、出版商共拟版税条例。成立了以欧阳予倩为首的“受难同志救济委员会”，为抗战中遇难作家的家属募捐。

其次，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动员和组织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深入民间，促进了文艺与群众相结合。“五四”运动虽然具有丰功伟绩，但“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充分发挥文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文协桂林分会根据党的指示，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救亡日报》及时发表了周扬的《作家到前线去》、司马文森的《把文艺种子传播到战壕、兵营里去》等文章，还出版了《戏剧游击经验专页》，发表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集体讨论记录的《怎样做游击区的戏剧活动》的经验。此外，又通过抗宣一队等剧团（队），为大家演出了当时延安创作的一批新节目，如《军民进行曲》、《农村曲》、《生产大合唱》等，为桂林的文艺工作者指明具体方向，从而使他们受到鼓舞。桂林的文艺工作者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为榜样，纷纷下乡入伍。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

1940年1月，由文协桂林分会组织的桂林文艺、新闻界桂南前线慰问团，开赴桂南前线，进行慰劳和战地采访。这次活动，既鼓舞了前线抗日将士，又使文艺工作者体验了战地生活，写出了一批反映前线抗敌将士斗争生活的作品。如报告文学《昆仑关之行》、《笔立在昆仑关的峰顶》、《邕宾路上的奇袭》等。另一次是湘桂大撤退前夕。为了安定民心，鼓舞士气，保卫大西南，桂林文艺工作者组织了“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宣传周”活动，成立“文抗会”（全称为“广西省文化界抗敌工作协会”），分派两个工作队，由田汉、陈残云、黎民任等带领，奔赴兴安、全州等前线进行宣传鼓动。值得一提的是抗敌演剧四个队，他们长年累月作为文艺轻骑兵活跃于部队、农村，坚持下乡入伍的方向。比如以广西为主要活动阵地的剧宣四队，从成立到参加西南剧展的七年中，足迹遍及国统区十省二百三十五个县、市，深入部队、农村共演出749场，观众达90万人次。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士兵和工农，剧目的内容以反映抗日斗争为主。可见，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在文艺与群众相结合方面，继承与发扬了“五四”的革命精神，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最后，在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和探索。文艺大众化问题，“五四”以来就一直在进行探讨，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取得显著成效。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争形势不但要求文艺同群众密切联系，更有效地为抗战服务，同时也为新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所以，当时桂林的戏剧、诗歌、小说、美术、音乐界，都曾就文艺的当前任务，以及通俗化和民族形式的含义与运用等问题，展开过广泛、热烈的讨论。其中最突出的是戏剧界。田汉曾多次往返于重庆、桂林等地，亲自主持召开《戏剧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并将讨论的内容进行整理，在桂林的《戏剧春秋》上连载，对抗日文艺运动起了指导作用。同时，田汉还与戏剧界的同志一起，对大众

化、民族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在文协桂林分会的带动下，文艺界积极进行实践。各个文艺组织经常举办各种通俗的大众化的文艺活动，如街头绘画、“六月街头诗”、街头诗画、诗传单等等。许多作家、艺术家带头实践，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抗日战争的具有民族形式的通俗作品。如黄新波の木刻连续画《老当益壮》（80多幅）、谷斯范的长篇小说《新水浒》、王鲁彦的小说《胡蒲妙计收伪军》，以及欧阳予倩的桂剧《梁红玉》、《木兰从军》，田汉的湘剧《新会缘桥》、新平剧《岳飞》等等。这些都为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和民族形式的运用提供了经验。

（二）锻炼造就了一支强有力的文艺新军。

八年抗战，我们的中华民族经受了考验，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的文艺工作者，也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锻炼。桂林当时是畸形发展的大后方，人口从数万激增至近六十万，物价飞涨，谋生艰难。背井离乡，从四面八方逃难涌入桂林的文化人，正如当年报刊上所说的，“每天忙于生活问题，在饥饿线上挣扎”。但他们集合于团结抗日的旗帜下，以拯救民族为己任，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活跃于桂林的文艺舞台上，并在斗争中成长着，这支文艺新军的成长，是在党领导和影响下，通过进步文艺团体特别是文协桂林分会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概括起来，主要是：

（1）积极组织文艺工作者参加社会活动，深入前线、工厂、农村，接受锻炼。文协桂林分会遵照党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有计划地组织在桂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如集会、游行、讲演等，还组织他们到工厂、农村、街道去，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曾多次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记者战地采访团、抗战文艺工作团等，奔赴前线，在进行抗日宣传中体验生活。不少戏剧工作者主动深入备受日寇蹂躏的

城镇和边远山区，一面进行抗日宣传，一面体验生活，创作出一大批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当日本侵略者刚撤离南宁时，抗敌演剧四队便火速开赴南宁，边作慰问演出，边协助群众做返回家园的安置工作，并根据耳闻目睹的情况，编演了《南宁无战事》等节目，强烈控诉日本强盗的滔天罪行，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接着，他们又开赴靖西县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利用宣传演出的间隙，办起了妇女识字班，并向群众教唱抗战歌曲，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由于他们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创作题材，而且利用民间文艺形式，编演了多幕剧《边城之家》、独幕剧《嫁不嫁》、活报剧《靖西风光》和富有壮族民歌风味的歌曲《保边疆》、《走私的人》等，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2）经常组织文艺工作者参加各种文艺讲习班和讲座，传授知识，培养人材。根据抗战文艺运动发展的需要，文协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简称“木协”）、国际新闻社等，均先后多次举办文艺、新闻讲习班和讲座，系统地向青年作者讲授文艺、新闻的基本知识。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文协桂林分会和“木协”于1940年8月联合举办的“暑期写作研究班”，聘请王鲁彦、欧阳予倩、艾芜、周钢鸣、黄药眠、黄新波、聂绀弩、林林、司马文森等十几位同志，分别讲授《文艺写作的任务》、《怎样建立新的戏剧》、《民族形式问题》、《诗的写作研究》、《题材与素材》、《典型的创作》、《舞蹈的创作》、《批评及欣赏》、《绘画艺术》、《怎样描写人物》、《怎样做一个导演》等共十四讲，每次座无虚席，听众踊跃。还根据各个时期文艺界出现的争论问题，请有关专家学者作专题讲授，有意识地组织大家开展《文艺上的中国化和大众化》、《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抗战中演戏上的几种倾向》、《抗战小说写作问题》、《民歌的收集和创作》以及《当前儿童读物的优缺点》等专题讨论，明确了抗战文艺创作的方向，加深了对文艺创作规律性的认识，使

青年文艺工作者迅速成长。

(3) 通过各种文艺刊物,发现和培养人材。当时,桂林创办的文艺刊物和综合性报刊有一百多种。这些刊物,尤其是地下党员主办或参加编辑的报刊,在发现和培养新生力量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不少散处在各地或各行各业的文艺作者,刊物编辑部从来稿中一经发现,就建立联系,积极指导,精心扶植。如当时远在桂南的青年秦似,1940年学写杂文,投稿给《救亡日报》副刊,具有自己的风格,引起了夏衍同志的注意。夏衍同志马上在该报刊登启事,邀请秦似到桂林,专门从事杂文写作。在《救亡日报》等刊物编辑部和夏衍等老作家的指导与帮助下,秦似很快就成长为杂文作家;并同夏衍、孟超、聂绀弩、宋云彬等一起办起了《野草》杂志。陈残云、秦牧原在桂林的一所中学教书,曾敏之原是广西地方建设干校的学生,由于桂林文艺刊物对他们的发现和培养,后来他们都成了知名作家。有些文艺刊物,如《文学创作》、《当代文艺》等,还通过评奖新人新作和举办“青年文艺写作研究会”等短训班,培养文艺新人。有些文艺刊物经常召开专题文艺座谈会,请老作家、艺术家给年轻的文艺爱好者谈经验,然后再整理成座谈纪要在报刊上发表,指导广大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和演出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杜宣代表《戏剧春秋》社召开的《国家至上》、《包得行》剧目演出座谈会,田汉代表《戏剧春秋》社先后召开的戏剧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司马文森代表《文艺生活》杂志社召开的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检讨会,邵荃麟代表《文化杂志》社召开的文学创作语言运用问题座谈会,熊佛西代表《当代文艺》社召开的战后中国文艺展望问题座谈会,等等。这些座谈会,不仅对指导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成长,而且对整个国统区的抗日文艺运动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 在政治思想上予以关心,在生活工作上悉心照顾。当

时，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的领导人，对桂林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十分关怀，曾多次接见夏衍、田汉、杜宣等同志和抗敌演剧队的负责人，并勉励他们。1939年2月间，周恩来同志从皖南新四军驻地视察回渝，途经桂林时，特地从百忙中抽时间前往东江镇看望新安旅行团的小演员们。后来，周恩来同志又多次通过“八办”李克农同志，给战斗在桂林的文艺工作者以指导。在皖南事变的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周恩来同志特派李亚群同志来桂林，传达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并协助司马文森等同志做好桂林进步文化人的转移和安排工作。周恩来同志还指示田汉，要做好团结桂林旧剧老艺人的工作。党还通过文协桂林分会等进步团体和进步报刊，对危害抗战文艺运动的种种谬论及时进行批判，如批判“文艺与抗战无关”、“反对作家从政”、“艺术至上”以及替法西斯张目的“战国策派”等等，从而使桂林文艺界保持正确的方向，做到思想端正，步调统一。

对于在桂林的一些贫病的文艺工作者，党十分关怀，及时拨款救济，并通过文协桂林分会等文艺团体，发起募捐，使他们及其家属在生活上得到一定的保障。如在湘桂大撤退时，《文艺杂志》主编王鲁彦不幸逝世，已疏散到外地的邵荃麟、司马文森、端木蕻良、曾敏之等同志，又冒着危险重返桂林，刊登讣告，撰写悼文，发起募捐，救助遗孤，并在战火中举行追悼会。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得知噩耗后，亲自发来唁电，安慰王鲁彦的家属，并叮嘱有关人员要“善抚遗孤”，还请冯雪峰同志设法转送抚恤费一千元（法币）给王鲁彦夫人覃英同志。在湘桂大撤退过程中，党及时拨来一笔救济款，交给邵荃麟同志，接济了艾芜等一批贫困作家，使他们顺利脱离险境。

（三）创作出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宝库。

这一时期，在抗战激情鼓舞下的桂林进步作家，紧密配合现

实政治斗争，面向民族解放战争的实际，创作了一大批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其数量之多，可以说是居国统区首位。据不完全统计，单东北作家群（如端木蕻良、穆木天、骆宾基、舒群、萧乾、白朗等）在桂林创作和发表的作品，便多达112篇（部），其中长篇小说、长诗、多幕剧就有33部。至于所有进步作家在桂林创作、发表的作品，数量就更是可观了，其中不乏佼佼之作。长篇小说主要有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火》第三部，艾芜的《山野》，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萧红的《呼兰河传》，沙汀的《淘金记》，司马文森的《雨季》，骆宾基的《人与土地》、《幼年》，等等。其中《霜叶红似二月花》和作者的另几部代表作，被认为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珍贵的财富”（见胡耀邦在沈雁冰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艾芜的《山野》被认为是“艾芜在新中国成立前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高峰”（《中国现代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4——725页）。短篇小说，更是不计其数。如茅盾一生创作的十二个短篇小说，就有九篇是在桂林创作和发表的。骆宾基《北望园的春天》，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作者艺术风格的一个短篇小说”（唐棣、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册）。张天翼的长篇童话《金鸭帝国》、老舍的《大地龙蛇》、郭沫若的诗《罪恶的金字塔》、田间的诗《她也要杀人》等，也都是在桂林首次发表的。戏剧创作也是硕果累累，颇具影响的话剧有，夏衍的《心防》、《愁城记》、《法西斯细菌》，田汉的《秋声赋》、《黄金时代》，田汉、洪深、夏衍的《风雨归舟》。历史剧有，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桃花扇》、《梁红玉》，郭沫若的《孔雀胆》等。这些剧本都是轰动一时的杰作。诗歌、散文创作更是前所未有，十分活跃。艾青的诗集《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是“艾青的诗跨入一个新的高度”的标志（谢冕：《他依然年青——谈艾青和他的诗》，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三